



复旦
博学
文库

本书由复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礼和天下： 传统东亚秩序的长稳定

陈康令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总 序

为了进一步提高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影响力,传承中国文化和社会科学研究精神,展示我校博士研究生培养成果,2013年7月,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党委宣传部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决定联合策划出版“复旦博学文库”,计划从每年毕业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博士学位论文中评选若干篇优秀论文,以学术专著的形式结辑出版。2015年出版的“复旦博学文库”第一辑即收录了六篇博士论文。

入选各辑“复旦博学文库”的论文,是在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初评后推荐的几十篇论文基础上,经学校评选委员会遴选产生的。无疑,它们代表了我校目前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准,反映了我校博士研究生们在这些学科领域中创新性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需要说明的是,入选“文库”论文的指导老师也都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尽管每篇论文都是各位博士研究生的独立之作,但与其导师的精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编辑和出版“复旦博学文库”,对我们探索中国现阶段如何培养高质量的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具有促进作用。近年来,我国所培养的文科类博士研究生数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不免担忧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质量是否存在问题。从近年来各级论文盲审和抽检等渠道所获得的信息看,存在严重缺陷的博士论文比例依然高居不下。这些问题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独到的见解和细致的分析。许多研究工作虽然不乏某些闪光点,但只对一些表面现象和统计数据进行浮光掠影似的探究,缺乏有洞察力的认识;二是投入研究的时间不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通常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

但一些研究生原有的学术功底不太扎实，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期间在学习和科研上投入时间又不够，达不到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三是写作不规范，缺乏缜密的逻辑和推理。更有甚者，学术违规行为和抄袭现象屡禁不止。因而，进一步端正学风，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成为了我校导师、研究生和管理者需要共同承担的艰巨任务。

我们的博士研究生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研究是一个十分艰苦的探索过程。每一项具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均是师生们反复斟酌选题、认真设计方案、仔细分析结果后所获得的，是他们的智慧和努力的结晶，也是随时间而积累的产物。事实上，博士研究生们为修改和完善论文而延长培养期限的情况也日趋普遍。尽管此次入选的论文中还存在一些写作仓促的痕迹，但从总体质量上可以作为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类博士研究生论文的标杆。出版“复旦博学文库”的初衷就是希望扭转当前较为浮躁的社会风气给研究生教育带来的不利影响，不仅能促进各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而且能为人文社会科学方向在读博士生们的学习和科研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促进我校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整体质量的提高，对提高我校博士研究生论文质量真正起到引领作用。

衷心祝愿我校研究生教育工作不断发展，收获越来越多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期望“复旦博学文库”越办越好。

研究生院院长 鍾揚

说明：“复旦博学文库”是2013年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钟扬院长大力支持下所推出的出版项目，是提高我校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钟扬院长生前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坚持每年都亲自为当年结辑出版的文库写序。2017年9月，就在他准备为第三辑文库撰写总序之时，突然遭遇车祸不幸离世。我们将钟扬院长为第一辑、第二辑文库所作的总序加以整合并略作删改，作为以后各辑文库的总序，以此铭记钟扬院长为复旦大学研究生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序

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能不能解释东方的历史，向来是学界争论的话题。这个话题在东西方相互交往日益密切的现代似乎没有多大学术价值，但要回溯到东西方缺乏交往的历史时代，其意义就非比寻常了。毕竟，东西方历史在发生真正的碰撞之前是很难通约的。即使存在相似的历史现象，也很有可能源自不同的历史根源。例如，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形成了“百年和平”的局面，尽管存在像克里米亚战争这样的冲突，但在欧洲没有发生大范围大规模的战争。而欧洲“百年和平”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欧洲大国之间的多极均势。与此相似，在东亚，从1759年清朝统一中国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八十多年间，也存在一段显著的和平和稳定时期。这个时期除了因安南和缅甸国内政权更迭而导致中央国家的武装干预外，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国际战争。但与欧洲“百年和平”不同，东亚的长稳定显然无法用均势的逻辑加以解释。那么在缺少均势的情况下，东亚的长稳定又是如何实现的？这便是陈康令博士论文要回答的研究问题。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著则是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成的成果。

陈康令博士主要从礼治的视角来诠释东亚的长稳定。该书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对于在传统东亚秩序中至关重要的礼治因素进行了全面剖析，明确提出了“礼治稳定说”。中国无疑是传统东亚秩序的主导国，但中国何以能够发挥主导作用？除了实力优势，恐怕规范力量，即“礼”或“理”，也是不可或缺的。跟大多数既有研究着重从实力角度解释中国与传统东亚秩序的兴衰不同，陈康令分析的焦点是礼治因素。他认为，礼治是维系传统东亚秩序的重要支柱，

其意义不亚于以实力为依托的统治。所谓礼或理，就是传统东亚秩序中由中国主导制定，此后逐步被各个地缘次级区域主要国家接受，具有普遍礼仪意义的国际关系准则，如克己复礼、礼尚往来、失礼入刑等。礼跟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规范非常相似。但在陈康令看来，传统东亚秩序中的礼(理)不仅跟主导国家的实力(力)密切相关，而且还直接事关国家间的利益分配(利)，因此是比规范更为复杂的概念。陈康令进而提出，当理、力、利三者处于一种相互配合和彼此适应的情境时，传统东亚秩序就会处于稳定状态，形成所谓的“礼秩”。他形象地用一大三小镶嵌在一起的四个正三角形来描绘传统东亚秩序的4Li稳定模型。其中，“理”三角由克己复礼、礼尚往来、失礼入刑三个礼治原则构成；“力”三角由示威、示好、示范三种礼仪逻辑下的权力运用方式构成；“利”三角由册封、贡赐、和亲三大主要天下礼制构成。

陈康令不仅从礼治角度提出了传统东亚秩序的稳定模型，而且还进一步将传统东亚秩序的结构更为贴切地概括为“塔型”，从而超越了大多数现有研究持平面视角的局限。这是他在这本书中做出的第二个理论贡献。传统东亚秩序在很长时间里被绝大多数学者描述为一种“同心圆结构”——即以中国为中心，根据周边国家与中国的政治、经贸、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亲疏远近，由内而外依次划分成几个国家圈。如果说这种“同心圆”结构描述了传统东亚秩序的横向结构特征，那么张小明教授提出的“垂直型互动关系模式”^①便是对传统东亚秩序纵向结构的揭示。陈康令将这两种思路结合起来，把传统东亚秩序的结构看作立体的，即“塔型结构”。他认为，传统东亚秩序之所以能形成稳定大势，不仅在于理、力、利的积极互动形成了有利于稳定的礼治，而且在于传统东亚秩序以成熟的礼治为内在核心，发展出了某种塔型结构，既能反映传统东亚体系中横向的层次性，也能体现其纵向的层级性。这种层次性和层级性并存的

^① 张小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塔型结构确保中央国家具有最高国际权威,以及各国之间的行为意图具有很高的确定性,长稳定因此得以形成和维系。历史上,传统东亚秩序的演进经历了从覆钵塔型结构(公元前2世纪初到公元7世纪中叶),到准楼阁塔型结构(公元7世纪中叶到公元13世纪中叶),再到楼阁塔型结构(公元13世纪中叶到公元19世纪末)的演进历程。

陈康令的“礼治稳定说”告诉我们:中国越强大,礼治越成熟,东亚越稳定。其内在逻辑是:实力的逐步壮大使中国有更多能力和意愿在国际层面推行礼治,国际层面的天下礼进入规范的礼典化和组织化进程,礼治原则、礼仪逻辑、天下礼制不断发展成熟,传统东亚秩序以礼治为核心逐渐形成层次性和层级性并存的塔型结构,国家间互动因此呈现出和平性、稳定性和可靠预期的基本特征。在我看来,“礼治稳定说”对传统东亚秩序的解释要好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稳定论或治下和平论,也优于在东亚非常流行的华夷秩序、朝贡体系、等级结构等理论。

此外,陈康令的研究还有一点非常值得称道,就是他的研究方法既没有简单套用,也没有完全排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从东亚历史出发将东西方智慧有机结合起来,对传统东亚秩序进行诠释。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光转向东亚历史和文化。但不论域内还是域外学者都很容易犯下以现有理论考察历史的错误。证明古代东亚就有民族国家,或国家形成的逻辑与西方无异,抑或证明在古代东亚国家之间也会因国家利益而采取或随强或制衡的战略,在我看来,并没有多大意义。更重要的是,通过研究东亚历史能够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和理论,从而能够对国际关系的理论发展有所贡献。例如,和、礼、仁、势等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当代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这些概念在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不存在对应物,将这些概念理论化,一定会对相关的理论发展有所推动。这是我多年以来一直想做的一项研究,也结识了不少认同这种看法的同道中人。但囿于自身历史和哲学知识的匮乏,这项研究计划没能如愿开展。令我非常欣

慰的是,我的博士生陈康令不仅开始了这项研究,而且已经找到了适合的路径。我知道这本专著只是他这项研究的起步,因此我期待他不断产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潘忠岐

2016年5月1日

导 言

巴里·布赞(Bu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指出:目前多数国际关系理论都被无意识地锁定在相对狭窄的欧洲和西方历史的范围之内。由此产生了一种深受限制的观点,发挥着“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的作用——它“意味着无政府结构和均势行为的假设成为国际秩序分析的先决条件,意味着部落、帝国等其他政治形式被边缘化,意味着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视角基本被排除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之外,意味着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关系前瞻理论受到阻碍。”^①目前国际关系学界比较缺少对不同时空环境下国际关系宏大叙事的整体、客观的把握和比较研究——因为这似乎是世界史学者和文明史学者应当关注的问题。但作为社会科学中极富生命力的一门学科,国际关系学不仅应当涉猎这些问题,还应当用本学科的逻辑、思维和方法来研究这些问题。正所谓“术业有专攻”,国际关系学更关注的是如何借鉴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分析、描述和解释国际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和回答更具普遍性和针对性的研究问题,总结和归纳出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和核心机制,结合较为前沿的研究方法充实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②

本书的研究主题是传统东亚秩序(公元元年前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亚国际秩序)如何保持长期稳定,并试图说明,传统

①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主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中文版序言。

② 在这方面,唐世平的开拓性研究令人印象深刻。参见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东亚秩序的历史演进与国际关系中礼治的发展变迁密切相关。本书提出,在传统东亚秩序中,存在一段显著的和平时期,即1760年清朝统一中国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间的80年。^①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中心国际秩序中的“百年和平”(Hundred Years' Peace)时期,即1814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间的100年。^②本书的研究问题是:如果说“百年和平”主要是遵循均势逻辑而实现稳定和平,那么传统东亚秩序的“八十年和平”主要遵循什么逻辑实现稳定和平?^③

国际关系研究的一大传统与渊源是“欧洲中心论”,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欧洲(尤其是西欧)各国在建立、维系和变革国际秩序过程中的历史和经验,这与西欧诸国及其后裔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和发挥的巨大影响密不可分。与之相对的、正日益突显重要地位的便是“中国中心论”,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国)在建立、维系和变革国际秩序过程中的历史和经验,这既与中国逐步彰显大国领袖风范密不可分,也是世界中心“由西欧向东亚转移”这一大势所趋的产物。^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中心论”源于费正

① 在这段历史时期内,东亚主要政权之间没有发生大战,小国也没有被长期吞并。

②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M. A.: Beacon Press, 2001, p. 5.

③ 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西欧秩序和东亚秩序都是地区秩序,但在大规模的全球化到来之前,传统西欧秩序和传统东亚秩序则都是相对封闭的国际秩序(或曰世界秩序)。这种观点主要受到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滨下武志、塞尔登(Mark Selden)等的影响。多伊奇将“世界区域”(world region)的内涵概括为:由许多邻近国家组成的,按照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在广泛领域中都存在显著依存关系的国家群体。阿里吉等人指出,东亚便是这样一个“世界体系”,但也不是只强调经济因素的“世界经济体”。[美]阿里吉、[日]滨下武志、[美]塞尔登:《导言:从地区和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东亚的复兴》,载[美]阿里吉、[日]滨下武志、[美]塞尔登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马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④ Christopher Layne, "The Global Power Shift from West to East",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June 2012, pp. 21-31. 罗兹曼(Rozman)认为:“现在只要看看该地区的诸多国家以及那些举家移居海外的东亚人所取得的最新成就,大多数研究者都会同意,东亚将拥有一个辉煌的未来。”Gilber T. Rozman, *The East Asian Region: Confucian Heritage and its Modern Adapta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

清(John K. Fairbank)等所谓“中国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①理论框架,其代表观点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通过“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的范式维持相互往来和交流,其核心假设便是“中华中心主义”(Sinocentrism)。^②但费正清对朝贡体系的研究却又是受到自身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他眼中的“朝贡”概念脱胎于罗马帝国一种“表示臣服的古代形式和一种榨取财富的专断形式”,而非东亚历史文化中“朝贡”的本意;^③

① 参见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中译本为[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② 费正清认为朝贡体系是“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的媒介”、“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以及“非中华地区的蛮夷之地在无所不包的中华政治与道德系统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机制”。“中国中心主义”的意涵即中国在周边国家中具有巨大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参见 John K. Fairbank and Ssu-yu Teng, “On the Ch'ing's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 No. 2, 1941, pp. 135 - 246; John K. Fairbank,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 No. 2, 1942, pp. 129 - 149;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 - 1854*, Cambridge,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Yu Ying-shih,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Relations*, Berkeley, C. 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③ 类似于“封建”一词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有所不同,“朝贡”一词也是如此。蒋廷黻在 1936 年所著“China and European Expansion”一文中,将传统东亚秩序中的“朝贡”一词翻译成“tribute”。在此基础上,费正清在 1941 年的论述中首次系统性地阐释了所谓“tributary system”是如何作为中国的对外关系制度而发挥作用的。后世学者便将此“tributary system”回译为“朝贡体系”。John K. Fairbank and Ssu-yu Teng, “On the Ch'ing's Tributary System”, p. 140。然而,西方所谓“tribute”跟东方所谓“朝贡”似乎并不具备同样的含义,前者充斥着主导帝国对周边政权的征服、强制、压榨、掠夺。Peter F. Bang and C. A. Bayly, “Tributary Empires—Towards a Global and Comparative History”, in Bang and Bayly, eds., *Tributary Empires in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6。相比之下,传统东亚秩序中“朝贡”的根本内涵并不是经济剥削。“朝贡”之“朝”,本意为觐见天子;“朝贡”之“贡”,本意为向天子进献贡品(多为当地特产,而非税收)。朝贡本为先秦时期中央与地方、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政治联系制度。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 页。经过不断演化,广义的朝贡是指一系列维系中外关系的制度规范,狭义的朝贡则是指传统东亚秩序中的一种贸易方式。

另一方面,在他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东亚历史上“中国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形态是孤立的、盲目的、落后的,这恰恰是东西方在19世纪不断发生碰撞冲突的导火索。^①按照萨义德(Edward Said)的话说,这种研究方式试图把“客观主义者”的西方理论运用于对非西方的分析,是把“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构筑为“本体”与“认识”的关系,并且本体高于认识。^②何伟亚(James L. Hevia)进一步指出,《东方主义》之后,反映或是记录“非西方”的现实都已经变得非常困难。^③

在当今国际关系学界,“西方中心主义”的烙印依然十分深刻。鲜有西方学者能摆脱欧洲的研究影响,从东亚自身的视角来研究东亚国际秩序。弗莱堡(Aaron Friedberg)在将现代东亚与500年前的欧洲历史进行比较时,甚至得出结论:“无论如何,欧洲的未来都将成为亚洲的未来。”^④要用“东方”自己的视角和方法来描述、分析和解释东亚国际秩序独特的演进和运行规律实非易事,但却极富意义。^⑤一条必经之路是充分吸取西方学界的研究方法和经验,建立起东西方国际秩序历史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间的联系,通过比较两者

① [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刘明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12页。

②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pp. 2-9.

③ 何伟亚:《怀柔远人》,第6页。

④ 传统西欧秩序和传统东亚秩序各具特色,例如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就说过,“如果不谈奴隶,不谈附庸性经济,欧洲是不可理解的。同样,如果不谈其国内的未开化民族和国外的藩属,中国也是不可理解的。”[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17页。尽管传统东亚秩序的一些现象和运行机制是可以用描述和解释传统西欧秩序的方法来研究的,因为这些现象和运行机制是两种秩序共通的。但我们也应该找到一些方法来研究传统秩序独有的现象和运行机制。

⑤ 一些西方学者,譬如基辛格(Kissinger)已经开始针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独特性展开丰富论述。参见[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林华、杨韵琴、朱敬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一章。江忆恩(Alastair I. Johnston)的探索也令人印象深刻,他很早就指出了东亚秩序自身的独特性。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之间的异同来探寻国际关系理论的增长点。^①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做出了有益尝试:

叶自成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范围内的“地区性国际体系”与1648年后的现代国际体系进行比较,提出先秦时期就存在独立主权国家这一命题,得到了一些评论和回应。^②阎学通等力图通过将西式研究方法与中式思想渊源相结合的途径,为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关系的运行机理提供系统性阐释。^③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的研究对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公元前656—前221年)与近代早期的欧洲(1495—1815年)。在对两者历史发展进程进行比较的过程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能由分裂走向统一,而欧洲自中世纪起就一直保持分裂(也就是多国体系)状态?她提出了一个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对此进行解答。该理论认为,支配逻辑与制衡逻辑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竞争结果不同会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不同,若前者胜出,则产生大

^① 有学者指出:“中国概念的发掘与植入需要遵循概念创新和理论创造的基本原则,在强调中国经验和文化传统特殊性的同时,也应注重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共通性。”刘丰:《概念生成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2期,第25页。苏长和认为,在人文社科研究中,我们要“对被覆盖和遮蔽的概念进行的再发现”。苏长和:《用中国概念讲好中国故事》,《人民论坛》2013年9月,第5页。

^② 参见叶自成的这些著作:《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第9—22页;《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视野》,《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第64—71页;叶自成、庞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第24—29页。针对他的观点的评论和回应参见:杨恕、王欢:《春秋时期诸侯国是独立主权国家吗?——与叶自成先生商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2期,第1—9页;辛万翔、曾向红:《春秋战国时期存在“国际法”吗?》,《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第153—163页;桑东辉:《也谈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是否为主权国家——以〈墨子〉为例、以国际法为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137—149页。

^③ 参见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阎学通、徐进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edited by Daniel A. Bell and Sun Zhe, translated by Edmund Ryde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外交思想》,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叶自成:《中国崛起——华夏体系500年的大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叶自成:《华夏主义——华夏体系500年的大智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一统格局；若后者胜出，则形成分裂格局。^① 赵鼎新认为，该研究是“把中国先秦史与近现代欧洲史进行详细比较的第一本专著”，但“所运用的比较历史学方法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虽然目前均盛于西方世界，却都存在着一些方法论意义上的误区”。例如，在选取比较研究对象方面，先秦时代的中国与近现代的欧洲具有巨大的时空、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尤其是两者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有意义的对称性比较。^② 康灿雄 (David C. Kang) 在《西方势力来到前的东亚》一书中，将东亚朝贡体系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进行了大量比较。他认为，前者是一种正式不平等 (formal inequality) 和非正式平等 (informal equality) 并存的国际体系，后者则正好相反。以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组成的东亚朝贡体系，有其自身独特的运行逻辑。等级制、儒家文化、朝贡贸易等都是该体系维系和平稳定的关键因素。^③

在受到这些卓越研究启发的基础上，本书将运用地缘学和国际关系礼治两大分析框架集中对传统东亚秩序演进规律进行探究。笔者首先将充分借鉴史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将传统东亚秩序的中枢区域、小中华区域、游牧区域和曼陀罗区域纳入到统一的地缘学分析框架下。接着，全面参考经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传统东亚秩序的礼治分析框架。运用这两个分析工具，笔者试图对传统东亚秩序的历史演进和稳定和平作出较为完整的描述、分析和解释。

^① 参见[美]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徐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徐进：《两种逻辑与双重博弈——评〈战争与国家形成：先秦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之比较〉》，《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4期，第82—90页。

^② 赵鼎新：《附录二：评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战争及国家形成〉》，载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家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197页。

^③ 参见 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目 录

总序	钟 扬	1
序	潘忠岐	1
导言		1
第一章 地缘学视角下的传统东亚秩序		1
第一节 从地缘学的视角考察传统东亚秩序		1
第二节 传统东亚秩序的中枢区域和中央国家		4
第三节 传统东亚秩序的其他三个次级地缘区域		8
一、传统东亚秩序的小中华区域		9
二、传统东亚秩序的游牧区域		10
三、传统东亚秩序的曼陀罗区域		12
第二章 传统东亚秩序的礼治：一种分析框架		15
第一节 跨学科视野下的礼：文献综述		16
一、比较视野下的礼、仪和礼仪		16
二、礼的四大价值追求：经学与美学的诠释		21
三、礼的两种社会功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解释		30
四、礼与权力的三组关系：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 分析		40
第二节 传统东亚秩序中的天下礼：概念提出		53
一、比较视野下传统东亚秩序的核心要素		54
二、国际法如何整合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		59
三、传统东亚秩序存在“天下礼”而非“国际法”		69

四、天下礼的基本内容	76
第三节 传统东亚秩序的礼治：理、力与利的分析	79
一、礼治之理：天下礼的基本原则	79
二、礼治之力：权力资源运用的礼仪逻辑	91
三、礼治之利：礼仪化的国际制度	97
四、传统东亚秩序的礼秩与“4Li 稳定模型”	108
第三章 传统东亚秩序的历史演进与礼治稳定	113
第一节 传统东亚秩序的历史演进与长稳定	113
一、国际秩序的系统性、自行组织性和演进性	113
二、传统东亚秩序的历史演进过程	118
三、国际秩序稳定性的内涵与传统东亚秩序的长 稳定	120
第二节 从国际秩序稳定理论到传统东亚秩序稳定理论	125
一、国际秩序稳定理论的基本范式	125
二、传统东亚秩序如何保持稳定：不同维度的解释	133
三、传统东亚秩序礼治稳定说的提出	139
第三节 传统东亚秩序宗藩观念的演进	141
一、传统东亚秩序的天下文化和宗藩观念	143
二、传统东亚秩序宗藩观念的君臣认同和拟血缘 认同	146
三、传统东亚秩序宗藩观念与国家的战争动机	149
第四节 传统东亚秩序天下礼制的演进	152
一、传统东亚秩序册封礼制的演进	153
二、传统东亚秩序贡赐礼制的演进	158
三、传统东亚秩序和亲礼制的演进	164
第五节 传统东亚秩序塔型结构的演进	169
一、传统东亚秩序体系结构的层次性和层级性	170
二、传统东亚秩序的覆钵塔型结构和楼阁塔型结构	173
三、传统东亚秩序塔型结构中的国家排列	178

第四章 传统东亚秩序的维系与礼治下的和平	182
第一节 传统东亚秩序的王朝正统与相关礼仪	182
一、中央国家王朝正统的建构维系与封禅礼仪	182
二、传统东亚秩序天下正统的建构维系与册封礼仪	185
第二节 传统东亚秩序的天下正统与主要战争	189
一、传统东亚秩序的天下正统与主要战争的相关性	189
二、重塑天下正统国际战争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193
第三节 传统东亚秩序礼治下的和平:1760—1840 年	198
一、礼治下的和平:建构与维系	198
二、从“中国礼仪之争”到传统东亚秩序及其礼治的 崩溃	203
结语	207
参考文献	211
中文部分	211
外文部分	237
后记	255

图 表 目 录

图 2.1	中国对其他次级地缘区域国家的权力资源与运用比较	94
图 2.2	传统东亚秩序的“4Li 稳定模型”	111
图 3.1	国家的战争动机:一种复合逻辑模型	152
图 3.2	覆钵塔型(stupa)和楼阁塔型(pagoda)建筑比较	174
图 3.3	楼阁塔型结构外观	176
图 3.4	楼阁塔型结构剖面图	177
图 3.5	传统东亚秩序准楼阁塔型结构的国家排列(俯视图)	180
图 3.6	传统东亚秩序楼阁塔型结构的国家排列(俯视图)	181
表 2.1	国际秩序核心要素的比较:传统东亚秩序和西方中心秩序	58
表 2.2	中国对其他次级地缘区域主要国家的权力资源运用效果的定性评估	92
表 2.3	传统东亚秩序的天下礼制	103
表 3.1	传统东亚秩序的历史演进过程	119
表 3.2	传统东亚秩序两种塔型结构比较	175
表 4.1	中枢区域与其他次级地缘区域间主要战争情况(中国元、明、清时期)	190
表 4.2	1644—1839 年琉球等六国对清朝贡次数一览	202